

● 国际政治

全球化与国家安全

江 涌¹, 胡剑萍²

(1. 武汉大学 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 武汉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江 涌(1969-), 男, 安徽无为, 武汉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理论研究; 胡剑萍(1976-), 女,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理论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研究。

[摘 要] 国家安全是一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 如何维护国家安全深受时代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 促成了国际社会的形成, 但迄今为止, 仍未能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法避免的相互依赖与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决定了国家的“安全困境”。与此同时,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国家安全的内涵及其维护手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关键词] 全球化; 国家安全; 无政府状态

[中图分类号] D 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99(2002)04-0453-06

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 在促进世界融合和发展的同时, 又给各国的主权和安全带来了挑战。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成为各国人民及其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国家安全的困境: 全球化过程的常态

作为今天各国交往的舞台, 国际社会是全球化发展的历史产物。可以说, 没有全球化的发展, 就不会有国际社会的形成。而活跃于国际社会的主角则主要是主权国家, 但直到中世纪, 现代意义的民族主权国家还没有形成。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主体, 主权国家诞生于近代欧洲。经过“30 年战争”, 1648 年, 欧洲各主要国家在威斯特伐里亚公会上确立了现代国际法的主权原则, 即每个国家拥有自己的中央管理机构, 具有对处理内部事务的最高权威。每一块土地上的居民只效忠于该土地上的政府, 而非外来的权威, 从而正式确立了受领土束缚的主权国家体系。到 17 世纪末, 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在明确划定的领土上建立起集中的法律和行政制度, 无论外部权威还是内部政治单位都不能对领土权限之内的中央立法权威构成挑战。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谈及的有关主权的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 主权包括“内部主权, 它意味着一定领土和人口以内高于其他所有权威的权威”; 另一方面, 还包括“外部主权, 它意味着独立于所有外部权威之外, 而非高居于其上”^①。也就是说, 不存在一个可以命令其他国家应该如何行为的权威, 没有一个行为者有合法的权威可以告诉国家应该做什么。因此, 国家至高无上的主权, 意味着“无政府的国际体系的实质”^[1](第 51 页)。

在主权国家范围内, 人们通常把建立秩序与建立政府并通过政府推行和维护法制关联起来。因此,

国内秩序的确立,通常也就意味着无政府状态的消除和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规范与控制,个体的基本安全和利益也受到国家最高权威的保障。但是,在国际社会,无论过去和现在,人类现有的行为方式和文明程度尚达不到形成某种具有最高权威的秩序的境地,因而也无法改变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在一个缺乏最高权威作为安全保障的国际社会中,各国都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他国的善意或承诺,必须自己负责自己的安全(涉及生存与发展),以免被其他行为主体攻击、奴役、统治或消灭。为获得安全,避免遭受攻击,必须积累越来越多的实力来防止外来势力的威胁。但反过来,一国实力的强大,又让其他国家感到安全受到了现实或潜在的威胁,从而引发其加强实力的意图和行动。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交互竞赛的局面:一个国家的安全可能被另一个国家视为不安全,一个国家准备用于保卫自己安全的手段对别国来说可能是个威胁,结果到后来还有可能发现自己的安全度比以前并没有提高多少。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其直接根源主要在于无政府状态下各国缺乏互信所造成的机会主义选择。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安全不但涉及一种客观现状,而且涉及一种主观心态,即安全感。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阿诺德·沃尔费斯在《冲突与合作》一书中指出,“安全,在客观意义上,表现对所获得的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2](P.28)。

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传统斗争方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据此,历史上曾经有人提出“贸易和平论”。该理论认为: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各国利益相互渗透,形成一损俱损、一荣共荣的局面,发动战争所带来的利益小于贸易所带来的利益,而其成本却远远大于贸易,从而使战争成为无利可图的非理性行为。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相互依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敏感性,即国际行为主体对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或体系中其他部分的发展是敏感的,敏感性程度取决于一个行为主体的变化是否会迅速引起另一个行为主体的变化以及变化结果的大小。二是脆弱性,即行为主体易于因这些变化的结果而受到损害。脆弱性以外部事件给国家或其他行为主体造成的代价来衡量,即使行为者对这些结果做出反应以尽量避免这些代价,但也不得不付出^[3](P.35)。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倾向于“敏感”与“脆弱”,一个行为主体的行为总是这样或那样对其他行为主体产生影响,势必引起其他行为主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又或多或少对原先行为主体的行为产生某种约束。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国与国之间越发相互依赖,但在现行的“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相互依赖的表现并不总是均衡或者双向的,强国、大国和富国,由于拥有雄厚的实力,控制着世界更多的资源,因此往往成为全球体系的中心,而弱国、小国和穷国自然成为中心的外围。决定世界秩序的强、大、富的发达国家,在很多情况下,置弱、小、穷国利益于不顾,要么凭借自己强大的“影响力”^②采取单边行动,攫取世界各国资源,用以维护自己的“安全与繁荣”;要么假集体行动之名,取一国私利为实。这样,所谓的相互依赖常常是片面和单向的。而这种片面和单向的依赖,决定着国际秩序不可能是平等和公正的。正因如此,世界不少国家为安全所构筑的“硬壳”受到侵蚀,小国的“硬壳”则消失殆尽^[1](第 58 页)。

因此,全球化虽然促进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而相互依赖的确可以产生某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合作的可能性,对战争也起到了某种抑制作用。但由于这种依赖是不均衡或不对等的,因而难以摆脱大国利益的现实主义逻辑,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各国依然面临着“安全困境”,尤其是弱、小、穷国,更是如此。

二、国家安全的新变量:全球化的时代影响

不同时代对安全有不同的要求。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安全的内涵及其维护手段也都在不断地变化。美国学者小霍姆斯认为,安全所应用的时间和环境不同,色彩和内容就截然不同^[3](P.24)。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安全所处的背景、影响变量和实现手段都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

第一,经济和科技的地位突出。传统上,维护国家安全,首先是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形成坚固的国

防;其次是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实现安全的外交。而决定这两点的基础是实力,即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其实,军事与经济、科技的关系古已有之,只是军事力量从没有像现在这么越来越依赖于经济与科技实力。构成实力的资源受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重要生产要素”。这些“重要生产要素”成为当时人类生产生活“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从而也是“最重要的”。谁掌握了这些生产要素的供给,谁就拥有了斗争的主动权。霸权的演进和权力的转移都与“重要生产要素”的更迭有关。另一方面,对这些重要生产要素的争夺与维护也需要有不同的有效手段。夺取土地的最有效方式不一定是夺取市场和资源的最有效方式。而且,不管哪种方式,都必须面对被征服者的反抗,承担由此而付出的代价。现代军事斗争早已不同于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火器的改进和广泛运用改变了过去主要由人数来决定战争胜负的局面,作为人的体力和脑力的延伸,高新技术的发展使传统作战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现代军事战争的胜利越来越依赖于现代化的大工业和高新技术,而经济实力作为潜在的军事实力对战争的胜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前苏联的解体,海湾以及科索沃战争等无不证明了这种趋势。而且,对于作为现代国家实力增长的重要资源,如资本、市场等,军事手段是难以奏效的。“军队也许能够攻克有形实体,但军队却无法攻克质的实体。在当前阶段,可以成为接管对象的目标已不再具有价值。”^[4](第30页)资本和市场的特点在于流动,现代经济的健康运行需要稳定的秩序和人们的积极参与,军事手段只会带来对抗和冲突,不像过去能够迅速将战利品转换为实力,更难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信息和金融安全迅速提高。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大发展推动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当今国际社会深受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影响。信息作为最主要的社会资源,以其无所不在的影响力整合着既存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状态,营造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平台。信息流转一方面可以实现更大范围的利益共享,另一方面信息的自由开放强烈冲击着国家这一政治行为体的“硬壳”。信息设备数量和功能的增加,以及国际互联网的日益扩大,使各国政府对信息扩散的控制力明显减弱,国家的政治边界形同虚设。信息技术革命无疑一方面增强了信息技术先进国家的地位和主权,为其通过大众信息传播进行文化意识侵略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却削弱了信息技术落后国家的地位和主权,使其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由于经济联系的日趋紧密,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由金融全球化而带来的金融风险,因金融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神经中枢地位而业已成为日渐重要的经济安全的核心内容。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列宁曾经说过,摧毁一个国家政权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摧毁它的货币体系。在今天,国际金融交易规模巨大,日交易额达万亿美元以上;手段发达,形成了24小时不间断的全球金融交易市场;创新不断,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大量涌现,维护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十分复杂而困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场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多年的积累毁于一旦,个别国家还由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甚至是社会危机。虽然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走出了低谷,但对外依赖却进一步加深,经济主权进一步削弱。

第三,非对称性影响不断上升。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一方面跨国(或国际)主义观念日益盛行,非国家行为主体(如超国家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甚至于国际恐怖组织)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正在日益突出,对国际社会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民族国家的“安全困境”,不仅有来自传统的国家行为主体的约束,而且还有来自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国际体系中的各类行为主体(包括非国家行为主体)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由于国际社会本质的“无政府”状态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因此,全球化之下的民族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主体“安全困境”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不断加剧。这样,国际社会中国家的安全以及弱小的群体,为实现自身的安全与繁荣(贴切地说是生存与发展),一方面通过自力更生、联合自强的途径来解决由“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安全困境”,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原材料燃料组织等便由此发端兴盛;另一方面,当通过自力更生、联合自强的途径无法或难以解决由“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安全困境”(被“边缘化”)时,极有可能走向极端与暴力。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多半由此而生。这样,在国际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主体在

世界舞台上的角色正在日益突出,国际突发事件的爆发越来越频繁,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也正因如此,民族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对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极端行为也越来越“敏感”,连一向自以为更加安全的强大的发达国家的安全同样面临严峻挑战。针对冷战后的国际形势,美国将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对称性威胁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

第四,规则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即具有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参与主体的影响,特别是西方大国对全球化的推动与主导,使得全球化进程带有浓重的西方色彩。正如一位德国学者所指出的: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结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由于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国家意识体现在经济密切交往中的资本主义性质。全球化使国际间相互依赖不断增大,冲突的成本不断上升。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牟取长远和整体利益,经过长期复杂的斗争和妥协,逐渐形成了各种国际规范与制度,其中包括成文的国际法、国际公约、多边协议和不成文的国际惯例等,以规范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交往与合作,减少交易成本。但是,任何一种规则都是一种制度化的利益分配模式。这些国际制度和规范,虽然考虑到了不同国家的最基本利益和要求,但主要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在某些方面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而使发达国家的特权合法化。规则的内容安排是实力斗争的结果,推翻它却要面临着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因此,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惯性,它标志着某种利益分配模式的建立,大国不仅可以凭借实力而且可以凭借制度本身的惯性使自己的特权合法化和长期化。正因为如此,对于在诸多方面已确立优势的西方大国来说,在旧秩序下倡导全球化是它们巩固、扩大优势乃至实现霸权的最有力手段。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争取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现实要求。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使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积极参与世界交往,这就为制度霸权提供了条件,当然更使关于规则的竞争日趋激烈。从过去的 GATT 到今天的 WTO,伴随每一轮回合的谈判都是近乎无休止的争吵,这种争吵业已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未结束,其实质就在于此。因此,如果说全球化使国际斗争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由矛盾激化之后的直接冲突转向于矛盾激化之前的规则竞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这种竞争日趋激烈。

除此之外,一些全球问题的涌现,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能源问题、跨国犯罪等等,也对国家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新变量。

三、“自助”与合作: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选择

国家安全的内涵是什么,如何维护国家安全,一直存在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争论。前者源于洛克的人是理性的假说,认为战争是非理性的行为,各国可以通过国际法、公众舆论采取集体安全等措施防止战争的爆发,通过交流建立互信。而后者认为,注重国家实力和国家实力的分布,强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对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的认识和评论,对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模式的不同选择,对国家安全利益目标的不同追求,这些都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

不论理论上存在什么分歧,在现今生活中,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就是保卫国家主权,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权。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生活在地球之上的特定部分,在法律之下组织起来并且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联合。国家主权是社会个人权利的集合体,也是全体国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集合体。主权作为国家基本属性,不仅包括独立权、平等权和对内最高管辖权,而且还包括自保权。主权中的自保权与由此引申的国家安全之间有着内在逻辑关系。布朗在《思考国家安全》一书中认为,国家安全是一种能力,保持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基于合理的条件,维持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经济联系,防止外来力量打跨它的物质、制度和统治,并控制它边界。^[5](第 4 页)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促成了国际社会的形成,但迄今为止仍未能改变国际社会的无

政府状态,各国依然面临着“安全困境”。通过“自助”来维护国家安全仍然是大多数各国的首要选择。

全球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尽管没有结束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同时各国又出于利益要求自愿开展相互交往,从而形成建立秩序的普遍要求,由此诞生了国际法”^[6](第3页)。而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各种国际规则一旦确立,反过来又对主权国家自助的范围和方式加以限制,使得国际交往并非完全无章可循,而呈现出一定的秩序来。特别是全球共同问题的涌现,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其安全所面临的所有挑战。加强国际合作是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选择。

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国家安全理论不断受到挑战,不断得到发展。从传统的国防安全、外交安全到现在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在内的综合安全,从同盟安全、均势安全到目前的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从而使国家安全的外延不断扩展,呈现出时代性、立体性和技术性等特点。因此,维护国家安全应从主观和客观、国内和国外相统一的角度进行。

首先,立足于内部安全。面对全球化经济和信息的冲击,国家除了加强国防建设外还必须改进和完善各项职能,巩固内部安全,防止外来的不利影响,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在政治上,要加快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减少和消除社会不公正现象和制度,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妥善处理民族地区问题,以巩固和增强公众的信任和忠诚,从根本上防止敌对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攻击,以及由于内部冲突、分裂而招致外来干涉的可能性。历经无数劫难而盛极一时的苏联没有败倒在残酷的战争中,却崩溃于平时时期,其教训值得深刻反省。在经济上,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确实增强竞争力。同时,适应金融全球化的潮流,合理安排外资,提高利用效率,加快和完善金融监管,防止因投资结构不合理和金融投机而造成的金融危机。另外,在资源问题上,开源与节流并重,走资源消耗低的集约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特别要注重重要战略资源的储备和利用,以维护其在特殊时期的安全供给。在外交上,实现对外交往的多元化,减少对某一个或几个国家或地区的依赖。

第二,加强国际合作。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的普及,一个国家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且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的历史运动。应从世界范围来考量国家安全问题,维护国家的安全应从封闭的独守家门的模式,转变为积极进取和开放的模式。

(1)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闭关自守,通过对外开放及时学习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文化意识,互通资金、信息和物流,是实现和发展国家利益,巩固国家安全的根本举措。

(2)基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国际社会安全竞争和“安全困境”的长期存在,加强国际合作,实施预防性外交,不仅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效果,而且即使不得已临战也可以做到未战先谋。就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稳定大国关系,避免矛盾的激化,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加强合作,反对单极企图,巩固周边友好,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一项长期任务。

(3)针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和跨国犯罪等所构成的威胁,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地对付,从而维护各自的安全。

(4)就资源、能源、环境、气候等全球共同问题开展国际技术、信息、资金和法律合作,合理分担义务,为人类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景,实际上能减少和避免因这些问题的激化而加剧各国竞争甚至冲突的可能性,有利于维护共同安全,从而确实维护各国的长期安全。

由于参与全球化的各主体发展不平衡,全球化的发展必然是一体化与多样化、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过程。“只要世界是无政府状态的,只要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只要人类在价值上存在分歧,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就不会轻易失败…以追究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家行为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仍是世界政治的本质所在。”^[7](第35页)维护国家安全仍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简单重复过去,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国家行为及国际社会发生了和发生着空前深刻的变化,使国家安全的内容及其维护手段不断面临挑战。

注 释:

- ① 参见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p.8.
- ② 参见 K.J. 霍尔斯蒂曾经列举了六种不同战术, 包括: 使用武力、以非暴力方式施加惩罚、以惩罚相威胁(大棒政策)、给予奖赏(胡萝卜政策)、悬赏以及劝说。参见 K.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6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2), chap.5.

[参 考 文 献]

- [1] [美] 布鲁斯·拉西特, 哈维·斯塔尔. 世界政治[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 [2] WOLFERS, Arnold.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 [3] KEOHANE, Robert O. & Nye, Joseph S.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M]. Boston: Scott, Foresman, 1989.
- [4] [以] 西蒙·佩雷斯. 新中东[M]. 钟建国, 戴阿弟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4.
- [5] 孙晋平.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安全理论[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0, (4).
- [6] [美] 熊玠. 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M]. 余逊达, 张铁军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 [7] 刘靖华. 霸权的兴衰[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叶娟丽)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JIANG Yong¹, HU Jian-ping²

(1. Wuhan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 Politic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JIANG Yong (1969-),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Wuhan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majoring in world economic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HU Jian-ping (1976-), female, Graduate,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 Politic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world politics and economics.

Abstract: 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primary target of a country's external strategy. How to safeguard it is influenced deeply by the times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 environment. Globalization promotes the interdependenc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result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however, anarchy of which, hasn't been changed so far. This kind of inevitable interdependence and anarchy have brought about the national security dilemm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s safeguarding measures have been changing continuously.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national; security; anarchy